

## 国图藏《四明文献考》作者即李孝谦\*

钱茂伟

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有一部无名氏编纂的《四明文献考》，24册，12行22字，蓝格，蓝口，四周双边。目前已经收入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28册。首残，在《总叙》前有半篇残文，似序，称“碑记等为五卷，附于其末。噫！年历四十馀，守更数七政，其间非无锐意立事，欲作为一书、垂之永远者，或因循未暇。今公示是念于黄堂之上，财六旬而编帙粲大备，鸠工刊木，昭示将来，信乎天下事非立志坚而用意到，畴能有成哉？乾道五年四月初一日，右修职郎新处州缙云县主簿主管学事三山黄鼎序。”这似乎表明，《四明文献考》成于南宋乾道五年（1169）。不过，有关书目均不及此书。再进一步查考，才发现此序是黄鼎的《乾道四明图经序》。

《四明文献考》收录《乾道四明志》、《延祐四明志》、《至正四明续志》，及王安石、黄震、黄潜、袁桷、叶适、戴良等人文集涉于四明文物者。此书随书抄录，没有卷帙，但有连续页码。为了便于读者的了解，稍区分为21个部分：

第一，未标目，页1-172，册1-5，实为《乾道四明图经》。

第二，标“四明文献考”，收录《先贤》，页173-207。实为《延祐四明志》卷四《人物考上》。

第三，标“四明”，始“史浩”至“逸士”，页208-236，以上册6，实为《延祐四明志》卷五《先贤中》。

第四，标“四明”，收录史忠定（史浩）《十二先生赞》，页237-240，册7。实为《延祐四明志》卷六《人物考下》。

第五，未标目，收《集古考》，页241-283，册8，实为《延祐四明志》卷十九至二十《集古考》上下。

第六，未标目，页284-328，收《四明续志·集古》上下。

第七，未标目，页329-404，收《延祐志·学校考》，实为《延祐四明志》卷十三至十四《学校考》上下。

第八，标“四明文献考”，收录鄞县人、太常寺官员藏格在嘉定十二年

\* 本文系宁波大学2011年度学科建设项目“宋元时期浙东学人思想研究”成果之一。

(1219)写的《濂溪先生周元公谥议》、《明道先生程纯公谥议》、《伊川先生程正公谥议》三篇谥议文章,页405-409。以上册9-12上。

第九,标“四明文献考”,收《临川先生文集》,页410-424,册12下。

第十,标“四明文献考”,收《宋邹郑公文集》,页425-433。

第十一,标“四明文献考”,收《东塘袁公文集》,页434-436。

第十二,标“四明文献录”,收《叶水心先生集》,页437-444,以上册13。

第十三,标“四明文献考”,收宋史馆检阅黄震东发《戊辰传史传》,页445-478。

第十四,标“四明文献集”,无书名,实为《松雪斋文集》,页479-484。

第十五,标“四明文献录”,收《柳待制文集》,页485-495,以上册14。

第十六,标“四明文献考”,收《清容居士集》,页496-651,册15-19。

第十七,标“四明文献编”,收《渊颖吴先生集》,页652-664,册20。

第十八,标“四明大献编”,收元《黄文献公集》,页665-695,册21。

第十九,标“四明文献考”,收元国子丞陈众仲(旅)《安雅堂集》,页696-701。

第二十,标“四明文献考”,收《九灵山房集》,页702-794,册22-24上。

第二十一,标“四明文献考”,收王忠文公祔子充《华川集》,页795-806,册24下。

此书版心一律墨钉,没有书名。各部书前目录,或作《四明文献考》,或作《四明文献录》,或作《四明文献集》,或作《四明文献编》,甚至误作《四明大献编》,没有统一的书名。徐时栋说:“其或称考,或称录者,亦是随意标题,并非定名。”<sup>①</sup>从所辑录的内容来看,此书没有考据色彩,称《四明文献录》是比较合适的。至于被定名为《四明文献考》,可能是因为在四个名称中“四明文献考”出现频率最高,达10次。

《四明文献考》最后收录的作品是明初王祔<sup>②</sup>(1322-1372)《华川集》。考《华川集》是王祔卒后由方孝孺精选而成的。“华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,其子绶、绅将传其文于世,天台方孝孺为择精醇尤可传者若干首,定为若干卷”<sup>③</sup>。此可知,王祔洪武五年出使南粤,并卒于此年,则“华川先生出使南粤之九年”应在洪武十四年(1381)。据此可知,《四明文献考》的编纂者也可能是明初人。符合这个时间段的人,目前来看有两个人,一是郑真,二是李孝谦。

郑真(1332-1389后),字千之,鄞县人,洪武四年(1371),浙江乡举第一,

①徐时栋:《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》卷五《杂录上·乾道四明图经》,咸丰四年(1854)甬上烟屿楼徐氏刊本。

②前人据《明史》等资料误作“祔”。据家谱,王裕、王祔、王补三兄弟都作“衣”旁。徐永明《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5年)下编第五章《王祔年谱》已作考订。

③方孝孺:《逊志斋集》卷十二《华川集后序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授临淮教谕。后升广信教授。郑真认定“吾四明文献，冠东南诸郡”<sup>①</sup>，所以，“好论著前朝典故及乡里人物”<sup>②</sup>，尝采摭乡先生言行文辞，萃为一编，曰《四明文献录》，收录南宋迄元四明诸学人，如董复礼、史弥远、黄震等 27 人诗文、小传，各家诗文后有郑真按语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6），张寿鏞曾刊《四明文献》二卷，作者即郑真。国家图书馆又有郑真辑《四明文献》四册，不分卷。从内容可知，《四明文献考》作者不应是郑真，更大可能是李孝谦。

李孝谦（？-1422），鄞县人。李嗣邺《甬上耆旧诗》卷四《至孝李先生本》，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最为详细的李孝谦传记，录于下：“字孝谦。父仕开，操履严正，里中比之王彦方。生三子，长即先生，次悌谦，次忠谦。当元末，仕开杜门，为子弟择贤师友，不妄交游，一时金华戴良、永嘉高明、豫章揭伯防、武林杨彝、（台州）陆德旸、慈湖胡舜咨诸先生，俱以齿德文章，来游四明。仕开为扫席馆舍，使诸子俱师事之，故李氏造学渊源，最为有本。先生甫十岁，即能缀文。二弟俱明锐嗜学，兄弟相友爱。有事，兄必先弟，而弟常代兄行。父卧疾，先生兄弟日更侍床下。父食，乃敢食，父至断食旬日，亦饮水充腹而已，终勿执箸。洪武初，郡国例造战舰，吏以仕开饶财，使任督。既成，使者验舰材不良，坐法，送秋官论狱。先生甫弱冠，请代父囚，曰：‘父老我壮，宜往。’悌谦甫十八，已为人后，亦曰：‘兄多疾，且亲所爱，宜留，我当往。’使者以为非情，两系之，徐侦其兄弟，终无易词，竟遣长者往。先生至都门输作，日涉冰雪，负土石，手足酸痠流血。经一岁，得赦免归。十年，仕开又以富室主料量米耗罪当死，忠谦年十九，即荷械诣官，曰：‘盗米者囚，身当坐，幸释老父。’官赧其气貌，许之，得免死，黥而戍，竟死辽东。仕开卒，先生执丧尽礼。守令重先生，相继论荐，固辞不出。郡博士郑深道常造其家，先生闭门不见，深道曰：‘所以来求一识先生耳，非有它也。’乃出与语，甚欢，深道为止宿去。会诏天下纂修图志，太守汪燹起先生总裁郡乘，书成而卒。后七年，悌谦亦卒。先生宿有隐德，邻人寝疾，晨候之，密以钱十缗置席下去。绕宅种竹，夜遇人盗笋，纵之去。次夕，为采笋置篱外。其行事多类此。尝悯郡中文献失徵，因撰《四明文献录》、《四明先贤记》，学者宗之。他所著有《经书问难》、《通鉴考证》、《急就章注》、《长律英华稿》、《中林集》诸书。”由此可知，李仕开是四明富户人家，喜欢与名人交往。元末乱世时，因方国珍治下的庆元相对太平，故吸引了全国不少学人前来游学。李仕开家是他们的聚结地之一，他们一边教书，一边交游。李孝谦兄弟正是他们的弟子之一。明初，实行打击富户政策，于是，李家遭难。

李孝谦编纂《四明文献录》，与主修永乐《宁波府志》有关。关于李孝谦修永乐志时间，诸书皆以为永乐十七年（1419）所修。考永乐《宁波府志》的监修汪燹为宁波知府是永乐十九年（1421），由此可以肯定这次修志时间在永乐十

①郑真：《荥阳外史集》卷九《晚节堂记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郑真：《荥阳外史集》卷九一《貽史文可》。

九年以后。全祖望以为李孝谦修《永乐宁波府志》在永乐六年(1408)以前。“成祖诏天下府州县,皆修志书。时方修《永乐大典》,天下之志皆入焉。诸书皆以为十七年所修。考《大典》成于永乐六年,则志之修亦在六年以前也。书专为大典而作,既贡书局,未尝付梓,故今天下之传永乐志者最少。吾乡志书,其为吾家所藏者,自宋以下,无一不备,少者永乐志耳。及钞《大典》,始得之。是志也,里人纪徵士宗德、李处士孝谦为之,其书体例绝佳。”<sup>①</sup>这应该是将两次修志时间混淆所致。从有关情况来看,永乐时期的《宁波府志》纂修,至少有两次,一是永乐六年前,为《永乐大典》服务,二是永乐二十年前,为《一统方輿志》作准备。李孝谦参加了两次府志纂修,前次与纪宗德合修,后次与杨范(1375-1452)合修。杨范永乐二十年(1422)完成的《壬寅集》收有一诗:“郡国修书聘总裁,远将尺素两生来。欲为一统方輿志,愧乏三长良史才。朴学粗知蝌蚪字,拙工难造凤凰台。逊辞再四终难免,拂拭荷衣起草莱。”小序称:“近闻朝命,令郡国纂图志。郡博楼睦中先生以予能文报,官遣庠生蔡豹、杨迪敦请。自顾鄙陋不足用,因作口号以自述。”<sup>②</sup>由此可知肯定,永乐二十年(1422)曾有过宁波府志编纂活动。由上“书成而卒”,则可以将李孝谦的卒年定为永乐二十年。李氏诸书均不传,今惟有部分诗作传世,朱彝尊《明诗综》卷二二《李孝谦》收诗七首,《甬上耆旧诗》录诗22首,为目前收录最多者。李孝谦“尝悯郡中文献失徵,因撰《四明文献录》、《四明先贤记》”。从以上考订来看,这个时间点应在永乐六年至二十年(1408-1422)之间。

《四明文献考》作者可能是李孝谦,最初是由清初宁波籍史家高宇泰(1614-1678)提出的。高宇泰说:“公所列《四明文献志》有四,而郑解元所纂者名《文献集》,非志也。李司空者则名《志》。予皆有其书,独李孝谦所纂者未见。外又有《文献考》五本,取王临川、叶水心、邹忠公、袁东塘、赵文敏、黄文宪、柳道传、吴渊颖、戴九灵、陈众仲、王华川诸集碑记序传志跋等文,凡有涉于四明文物者,各简录之,而删乾道、延祐二志合焉,亦抄本也。予得借于友人闻氏,字画精楷。予尚疑其为缺帙,不止于斯。未知何人所纂,岂出于孝谦者乎?为是编者,深有功于桑梓者也。惜不著其姓名,并无序耳。”<sup>③</sup>高宇泰搜集到了四部《四明文献志》,独不见李孝谦《四明文献录》,却另得《四明文献考》,于是猜测此书即李孝谦之《四明文献录》。后来,清中叶的全祖望(1705-1755)曾从天一阁抄得一部,明确肯定是李孝谦所作之《四明文献录》,称“其书尚未分卷次,盖垂成之作”<sup>④</sup>。晚清宁波学人徐时栋(1814-1873)也见过此书,“此书,余亦得见之,细楷,厚本,悉如武部所云”。他肯定高宇泰与全祖望“二公所见,同

①全祖望: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卷二四《永乐宁波府志题词》,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②杨存洪:《镜川杨氏宗谱》卷十九《著述》,1943年刊本,天一阁藏。

③高宇泰:《敬止录》第一册《历志考》,杭州古籍书店影印本,1983年。

④全祖望: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卷二四《四明文献录题词》。

是一书”，同时又提出怀疑：“谢山断为孝谦所作，未知何据。”<sup>①</sup>全祖望虽然没有提出证据，但显然不会是武断的猜测。

根据以上线索，大体可以对《四明文献考》的传播过程做一个勾勒。李孝谦卒后，稿子流入天一阁。宁波闻氏（可能是闻性道）也有一部抄本，五本，高宇泰曾借抄。清中叶，全祖望从天一阁抄录一部，“重为厘而次之，自《图经》后别为二十四卷”<sup>②</sup>。国家图书馆本有连续页码，可能是全祖望加上的。1945年，张寿镛从宁波卢氏抱经楼抄得一部。此本二十四册，正合全祖望“二十四卷”，可以肯定是同一个版本。抱经楼何以会有此抄本？张寿镛提出两种假设，“意者范、卢二氏各有钞本，或范氏其后归卢氏，皆未可知”<sup>③</sup>。其实，应是全祖望所定抄本流入卢氏抱经楼更为合适，而天一阁本是未经整理的抄本。张寿镛藏书多人藏国家图书馆，今国家图书馆所藏《四明文献考》当为张寿镛所抄本。今抱经楼抄本早已不存，天一阁也无此书。国家图书馆保存了此书的抄本，且影印刊布，实乃大幸。

关于《四明文献考》的价值，清代以来学人一致认为核心在于保存乡邦文献。高宇泰称“为是编者，深有功于桑梓者也”<sup>④</sup>，全祖望称“其书精博，张制置之《图经》，非是录几不得传”<sup>⑤</sup>，徐时栋说“《图经》之传，则实赖是本者也”<sup>⑥</sup>，张寿镛说“吾乡文献精神所寄者，真可宝之异物也”<sup>⑦</sup>。这样的判断，大体是准确的。当然，今天可以从更广泛的视野中来理解其意义。

一是明代“乡邦文献”较早完成者。北宋以后，“文献”的使用开始频繁，内涵也有所限制与扩大，或文籍，或文脉，或理学，或文化。李堂（1462-1524）对“文献”有独到的理解，称“凡生乎吾土与吏焉者，其言论足以励世，词章足以阐道，是谓之文；德足以润身，行足以范俗，功业足以利民生，是谓之献。”<sup>⑧</sup>由此可知，“文献”是一个神圣的词汇，是指可以体现文化榜样传承的特殊文本。明代开始，在地方文化编纂中，更多的人使用“文献”做书名，如《新安文献志》、《祥符文献志》、《淮郡文献志》、《莆阳文献志》、《关中文献志》、《中州文献志》、《海盐文献志》、《常熟文献志》、《三吴文献志》、《三台文献志》。明人所谓“文献志”、“文献录”、“文献集”，多收诗文作品，实际上是地方士人所作或反映地方文化的诗文汇编。《四明文献录》正是这样一部乡邦文献作

①徐时栋：《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》卷五《杂录上·乾道四明图经》。

②全祖望：《鮑埼亭集外编》卷二四《四明文献录题词》。

③张寿镛：《约园杂著三编》卷二《四明文献录序》，《民国丛书》本。

④高宇泰：《敬止录》第一册《历志考》。

⑤全祖望：《鮑埼亭集外编》卷二四《四明文献录题词》。

⑥徐时栋：《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》卷五《杂录上·乾道四明图经》。

⑦张寿镛：《约园杂著三编》卷二《四明文献录序》。

⑧张邦奇：《四明文献志序》，见高宇泰《敬止录》第一册《历志考》。

品。宁波是目前所见最早编纂乡邦文献的地方。宁波是宋元时代的东南文献之邦,所以,宁波学人的文献意识也特别浓厚。早在元代,郑芳叔就喜欢“搜辑故事,日识见闻”<sup>①</sup>。他“乐于称道人,有一词之善,必手录之”,成《乡先生词翰》,开四明文献汇编先例。到了元末明初,郑芳叔孙子郑真继承前志,编纂了《四明文献集》。此后有李孝谦辑《四明文献录》、黄润玉《四明文献录》、李堂《四明文献志》(今辽宁图书馆尚存一部)、戴鲸《四明文献录》等。乡邦文献受人注意且编纂成书,反映了地方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。这种精神,至今仍是值得学习的。

二是弥补明代前期出版的不足,便于乡邦文献的传播。中国的出版业,虽自宋代以后进入大发展时期。然而,图书文献的刊刻仍不是太普遍。特别是文集、地方志的刊刻,仍是比较稀有的事。明代前期,出版业十分落后,民间的图书出版是稀有之事。由于出版滞后,宋元图书的传播与流传十分困难。如果没有人有意识地加以搜集与抄录,是很容易失传的。有鉴于此,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开始重视乡邦文献的集录。郑真说:“夷考其人,皆吾乡典刑,后学模范。数十年来,衣冠故家,凋丧零落,问其子孙,不知宗谱之传,况敢望诵其遗文于残编断简之一二乎?”<sup>②</sup>由于忧心乡邦文献的凋丧零落,悯文献之无徵,于是接踵出现了这些乡邦作品汇编之作。《四明文献考》所录的诗文,今天虽然多可以找到原本,似乎史料价值不高,但在明代前期出版业滞后的特殊时代,这样的乡邦诗文汇编却是十分有意义的。至于个别稀见文章,如藏格的三篇谥议文章,检索《四库全书》及几部四明志,均不见记载,史料价值自然高。正是有了前人的精心传承,后代才能方便地看到宋元方志与文集。饮水思源,显然不能忘了《四明文献考》的传承与保护之功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

①李邕嗣:《甬上耆旧诗》卷三《训导郑先生芳叔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郑真:《荜阳外史集》卷三七《录〈乡先生词翰〉后题》。